

# 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 “三个万亿”说潜力

郝庆

邓剑洋

## 理论之窗

网络生态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格局，完善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当前，以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为基础的网络法治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构建。通过持续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网络空间主旋律高昂、文化创新活力迸发、崇德向善蔚然成风、网络环境风清气正。同时，网络生态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深度伪造技术用于诈骗、诽谤、扰乱社会秩序；“信息茧房”影响个人认知，社会凝聚、信息数据的非法获取和不当使用侵犯个人隐私、危害国家安全，等等。网络生态问题具有长期性、顽固性，必须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推动网络治理实现由“管”向“治”的根本转变。

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是指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围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目标，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常态运行为特征，以协同推进为方式，推动网络生态治理由阶段性整治向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转变的长效运行机制。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覆盖事前预防、事中监管、事后处置全过程，贯通内容生态、平台运营、算法机制、数据安全等重点领域，统筹行政、市场、法治、科技等多种手段，着

力解决治什么、谁来治、怎么治、如何持续治的问题。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既需要通过明确规则边界和责任要求，夯实治理基础，又需要通过动态调整制度工具，提升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坚持前瞻性布局，下好风险防范“先手棋”。为防止风险积聚蔓延，保障治理长期有效，面对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给网络生态治理带来的挑战，必须以前瞻性的战略思维夯实长效治理根基，以高质量制度供给驱动网络治理中的风险变量，为网络生态持续清朗向上提供坚实可靠的制度支撑。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运用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把各类风险的综合研判纳入常态化工作机制，及时识别潜在风险形态，科学评估风险等级并实施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机制，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治理规范与技术演进同向同行。通过风险研判前置化、规则供给常态化、制度调整机制化，推动治理从事后应对向源头预防转变，使网络生态治理在起点上即具备长期稳定运行的制度基础。

坚持精准性施策，练就精细治理“绣花功”。网络生态问题类型多样，成因复杂，表现各异，既有共性风险，也有个性隐患。面对不同平台形态、技术路径与应用场景中出现的网络生态问题，必须立足实际，分类施策，确保治理措施精准落地、效能持续发挥。把握问题本质，找准风险源头，厘清责任边界，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对象实施差异化治理策略，推动监管资源向重点领域聚焦，向薄弱环节倾斜，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完善与精准治理相适配的制度工具和技术手段，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建立健全问题发现、分析研判和处置反馈的闭环机制。通过精准识别风险、精准匹配手段、精准落

实责任，持续提升治理实效，形成权责清晰、协同高效、运行顺畅的长效治理路径。

坚持系统性部署，打好综合治理“组合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格局，形成治理合力。”网络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主体多元、领域广泛、链条复杂。必须强化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把网络生态治理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局中统筹谋划。切实做到上下“一盘棋”，治理“一张网”，建立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线索移交等联合执法机制，凝聚监管合力。整合各方资源，统筹各类工具，在机制上强化协同联动，在手段上注重刚柔并济，在主体上推动多方共治，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支撑的综合治理格局。通过推动网络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促进规则衔接、标准协同和措施联动，着力强化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的聚合力和穿透力。

坚持协同性联动，绘就多方共治“同心圆”。面对网络生态治理主体多元、边界交叉、联动密切的现实特点，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内织密多方协同的治理网络，对外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健全多方参与、协同联动的治理格局，形成分工明确、衔接有序、协作高效的共治体系。在国内治理实践中，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格局，以制度化方式健全协作机制。在国际治理实践中，积极参与全球网络治理规则制定和国际合作，在深化交流互鉴中弥合“数字鸿沟”，在共同应对风险中筑牢安全屏障。通过内外兼修、标本兼治，探索形成以健全长效机制为核心的网络生态治理中国方案，为国际网络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今年以来，城市发展的“三个万亿”话题引人关注。2025年，北京经济总量首破5万亿元大关，浙江温州、辽宁大连跻身地区生产总值“万亿之城”行列，广东深圳南山区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的地级市辖区。

“万亿之都”“万亿之城”“万亿之区”，从城市能级跃升中，可以看到区域发展的协调格局，亦可洞见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下韧性生长的态势。“奋力一跃”的一座座城市，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更多城市能级跃上新台阶，也引人思考：经济体量站上高位，该如何继续“求进”？潜力在哪里？

对于站上高位的城市来说，打造发展“第二曲线”是关键命题。要在发挥优势的基础上，锻造新的长板。比如，深圳低空产业起步较早，企业密集，全力竞速低空经济新赛道。2025年深圳低空经济与空天产业集群增加值350.61亿元，同比增长31%。陕西西安新材料产业基础好，于是当地抓住产业链协同“牛鼻子”，以“同源共链”模式让新材料产业撬动多个产业集群共同发展。立足特色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新产业新动能，才能推动城市发展再上新台阶。

经济体量越大，越要有全局视野，以区域统筹拓宽发展空间。经济体量大、发展速度快，难免会对周边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区域协调发展正是破局之道。上海研发的控制

器、浙江的伺服电机、江苏的减速器、安徽的壳体……在长三角，机器人“4小时产业园”加速形成。三省一市各展所长、协同发展、握指成拳，让机器人实现核心部件100%本土化、整体国产化率94%，成本降低40%。做大经济发展的“蛋糕”，实现多方共赢，谁也不会吃亏。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柴米油盐到衣食住行，不断跃升的经济体量，最终要体现在群众越来越好的生活里。老旧小区改造，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不正蕴含着巨大的投资空间？从“养老”到“享老”，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日益成为现实，不正催生着广阔消费市场？抓发展是为了惠民生，而民生改善也会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为城市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不断织密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民生保障网，办好群众关心的“关键小事”，定能让城市里充满可感可及的温暖，实现城市能级跃升与群众幸福期盼同频共振。

“三个万亿”，彰显中国经济的巨大潜能，折射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十五五”开局起步，期待更多城市向高攀登、向新而行，共同奔向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

百家言

## 让科技话语权与科研实力共生长

喻思南

近期，两个科技领域的发布联系起来看意味深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工程院遴选出“2025全球工程前沿”，两个发布不仅具有专业领域的影响力，也彰显出我国科技领域的话语权持续提升。

科技创新不仅是硬实力的比拼，也是国际话语权的较量。发布带有评价性质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展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大进步，也彰显对科研的价值判断；遴选“全球工程前沿”，为洞察全球工程科技发展提供中国视角。两者通过传播创新理念，不断增强我国科技创新的号召力、影响力。

高质量科研成果是获得话语权的前提，但话语权并不必然伴随科技发展而产生。与近年来快速崛起的科研实力相比，我国科技话语权提升相对缓慢。以人工智能为例，我国在该领域论文投稿量、科研贡献度全球领先，一些重要学术会议半数录用成果来自中国学者。然而，在人工智能学术社区、国际学术组织建设等方面，我国基础较为薄弱，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实现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关键一跃，掌握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

积极主动发声，占领科技创新的话语“高地”。科技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科研成果的评价、创新方向的选择，进而影响国际顶尖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的流动。长期以来，美西方通过科研、高等教育等领域设置各种排行榜来霸占科技话语权。近年来，我国在一些前沿领域逐步从“并跑”向“领跑”跨越，为我们占领话语“高地”提供了底气。无论是发布“科学进展”“科学突破”等榜单，还是对科技前沿方向作擘画，都有利于彰显由我主导的科技创新话语权。

建强科技期刊，不断积累学术发表“主场”优势。科技期刊、国际会议等的刊文标准、研究趣味直接影响学术导向，是掌握科技话语权的关键途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基础研究存在题目从国外学术期刊上找、取得成果后再花钱到国外期刊和平台上发表的两难“在外”问题。这一现象滋生“唯西

方期刊、唯国际顶会”的不良导向，也使我们承担了西方学术平台货币化带来的高额成本。锚定差距补短板，需要建设与国际科研实力相匹配的国际一流科技期刊，在期刊质量、内容传播等方面持续发力，吸引全球优质稿源，与国际科技界携手，共同树立新的学术评价风向标。

参与国际科技治理，为全球科技交流提供公共产品。获得科技话语权，需要深度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和治理。从深度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国际合作项目，到牵头发起“深时数字地球”“海洋负排放”“植物星球计划”等国际大科学计划，从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到成立世界数据组织，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成为国际科技合作和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我们既要“做客”也要“请客”，努力在全球科技舞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自立自强的基础上深化开放合作，这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大道、正道。在建设科技强国征途上，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开放，让我国科技话语权与科研实力共生长，必能为我国成为全球创新高地提供助力，为全球科技发展注入活力。

让科技话语权与科研实力共生长

让科技话语权与科研实力共生长

让科技话语权与科研实力共生长

让科技话语权与科研实力共生长

让科技话语权与科研实力共生长



出水芙蓉（国画）国家作



独钓寒秋（国画）国家作

## 载体转移与记忆守护

# 《市中石碑石刻拾遗》的档案化实践与地方文史建构

杨同侠

郭金鹏

## 特别推荐

“金石永固”是中国古代对石刻媒介的朴素信念。然而，历史吊诡之处在于，恰恰是“石”这一被认为最坚硬的载体，在自然风化与人为损毁面前脆弱不堪。枣庄市市中区境内散布的石碑石刻，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历经唐宋至明清，构成了层累的地方记忆谱系。但露天保存的石刻字迹漫漶、残损断裂者不在少数，面临彻底消失的危机。

### 石刻危机与档案化转向

这一困境折射出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普遍难题：物质载体一旦损毁，历史信息随之湮灭。在此背景下，枣庄市市中区政协于2024年3月启动石碑石刻的采集拓印工作，组织专家历时近一年，走访11个镇街、80余个村居，最终于2025年1月出版《市中石碑石刻拾遗》。这一举措的深层意义在于：它以“纸上保存”的方式，实现了石刻信息的“载体转移”——将不可移动、易受损害的原始石刻，转化为可永久保存、可广泛传播的纸质文献。这正是档案学意义上“档案化”（archivalization）的核心操作。

将石刻纳入档案学视野，需要回答：石刻是档案吗？传统档案学强调“原始记录性”与“有机联系性”。石刻作为当时人记述当时事的物质载体，无疑具备原始记录属性。然而，散落野外的石刻缺乏系统整理，其“档案”身份需经过特定的编纂行为才能确认和激活。换言之，石刻从“物质遗存”转化为“档案资源”，存在一个“档案化”的过程——《市中石碑石刻拾遗》的编纂工作正是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

### 编纂理路与方法论特征

（一）田野调查与文献考证的双重路径

编纂工作始于2024年3月，首要任务是“摸清家底”。工作团队实地走访11个镇街、80多个村居社区，足迹遍及卓山、夹谷山、龟山等地。这一田野调查突破了传统金石学“重拓片、轻现场”的局限，不仅获取拓片，更记录了石刻的现存位置、保存状况、周边环境等“痕迹信息”，具有不可逆性。记录了石刻在原环境中的位置关系。拓片则通过墨拓技术将刻痕中的文字与纹样“转印”到纸上，形成易于辨识的文本图像，便于复制与传播。“图片+拓片”的组合构建了双重保真机制：图片保存石刻的“物质性”，拓片保存石刻的“文本性”，二者相互印证，共同构成石刻信息的完整档案记录。

（二）时间跨度与收录规模的知识图谱意义  
该书最突出的方法论特征，在于采用“图片+拓片”相结合的方式。图片记录石刻当下的物质形态——石质风化程度、残损状况、周边环境等“痕迹信息”，具有不可逆性。记录了石刻在原环境中的位置关系。拓片则通过墨拓技术将刻痕中的文字与纹样“转印”到纸上，形成易于辨识的文本图像，便于复制与传播。“图片+拓片”的组合构建了双重保真机制：图片保存石刻的“物质性”，拓片保存石刻的“文本性”，二者相互印证，共同构成石刻信息的完整档案记录。

（三）时间跨度与收录规模的知识图谱意义  
该书汇集全区85件珍贵石刻资料，时间跨度从汉代至近现代，纵览两千余年历史进程。读者可通过一部图录观察到石刻形态、内容、功能的历时性演变；汉画像石的神秘瑰丽、魏晋摩崖石刻的宗教意涵、明清碑刻的世俗化倾向、民国碑刻的社会转型印记——构成一个可资纵向比较的“石刻时间轴”。系统化的资料汇编具有“奠基”功能，为后续专题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这正是档案工作“为明天保存今天”的题中应有之义。

### 新发现石刻的档案价值：以“靖康二年”摩崖石刻为中心

（一）发现过程与年代断定  
2024年8月，在夹谷山的田野调查中，工

作组于一处崖壁发现了刻有“靖康二年”字迹的摩崖石刻。“靖康二年”（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具标志性的年份——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石刻的年代断定主要依据纪年题款，“靖康”年号仅使用两年，带有该年号的石刻尤为稀少，鲁南地区此前尚无发现。这一发现填补了区域宋代石刻的空白。

（二）石刻内容与历史语境的互文解读  
石刻的学术价值可从三个层面理解：其一，为“夹谷山”的历史文化内涵增添新注脚——夹谷山因春秋时期的“夹谷之会”闻名，宋代摩崖石刻的发现印证了其在宋代仍是重要的文化地标。其二，“靖康二年”这一时间节点富含历史信息——1127年鲁南地区的政治状态、地方社会应对、民间对“靖康之变”的反应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其三，从档案学角度看，这处摩崖石刻具有“一次性记录”的原始属性，是当时人在当时地留下的即时印记。这是石刻作为档案的核心价值所在。

（三）作为“地方档案”的宋代石刻与区域史重建

地方石刻可以弥补官方史书“自上而下”视角的局限。散布乡野的摩崖刻、墓碑、祠庙碑记等，记录的是地方社会的事件与人物，承载民间视角的历史记忆。新发现石刻的档案价值不仅在于“增加一条史料”，更在于打开了通往区域史研究的新路径。当足够多的石刻资料被系统收集、整理、公布，研究者就有可能重构一个“自下而上”的地方历史图景。

### 地方石刻档案的功能维度

（一）“存史”：抢救性记录与记忆载体的转移

石刻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抢救性记录的紧迫性。“存史”的实质是记忆载体的转移——将附着于石刻上的历史信息转移至纸张这一更可控、更易保存的载体。编撰者在采集、拓印、考释、著录过程中，完成了对石刻信息的“档案化”操作：将散乱的原始遗存转化为有序的文献系统。即便原始石刻彻底

损毁，其历史信息仍以档案形式得以存续。

（二）“资政”：档案资源与地方文化治理  
该书系统呈现了市中区石刻遗存的家底，为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基础数据。枣庄市市中区近年来对碑刻石刻文物的保护力度显著加大，针对风化严重的卓山南北朝摩崖石刻，有关部门已委托专业机构编制保护方案并实施施工。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石刻档案的整理与公布还服务于地方文化品牌的塑造，系统化的文史编纂工作是“讲好市中故事”的基础工程。

（三）“团结”与“育人”：文史工作的社会功能

编纂过程本身是一个“团结”的实践——政协委员、文史专员、专家学者、基层干部共同参与，形成跨领域、跨层级的工作网络。“育人”功能则体现在石刻资源的公众教育价值上。《市中石碑石刻拾遗》通过图片与拓片的结合，使原本“藏在深闺”的石刻走进公众视野，成为乡土教育、历史普及的生动教材，旨在“唤起社会对石刻文物的重视与保护意识”。

《市中石碑石刻拾遗》的出版，是一次地方记忆的“档案化”实践——将散落乡野的物质遗存转化为有序、可及、可用的文献资源。这一实践表明：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诸多现实困难的条件下，“纸上保存”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虽然它不能替代对原物的保护，但它确保了历史信息的存续，为后人留下了研究的依据。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市中石碑石刻拾遗》所代表的，是一种“扎根乡土”的文史工作模式。它不追求宏大的理论建构，而是从一碑一石的采集、拓印、考释做起，在细微处积累，在沉默中深耕。这种工作方式或许不够“耀眼”，但它恰恰是地方文化传承最坚实的一环。每一处被记录的石刻，都是一粒记忆的种子；每一份用心编纂的图录，都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作者单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